



“红船”起航

觉醒前奏

人道的钟声敲响了，
自由的曙光出现了。
试看将来的环球，
必是赤色的世界！

1918年，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李大钊，对期待着希望的中国人说了上面这些话。从1840年开始，寻寻觅觅80年的中国，正是在这个时候，看到了曙光，开始觉醒了。

带来曙光让人们觉醒的就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提起五四运动，读过点书的人都不会陌生。“五四”已经成

为了一种象征，一个旧时代终结、新时代开始的象征。每年 5 月 4 日这天 总能让人想起新生 想起复兴 想起青春和躁动。被毛泽东推崇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 有着“永远的青年”的美称 而“五四”这两个字 则是所有“永远的青年”胸前的徽章。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那一代青年人，说起来，正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同龄人。

今天说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 1919 年 5 月 4 日前后的学生爱国运动，一个是指在此以前就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没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就没有 1919 年的学生爱国运动。而传播新思想的主角，就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文化人。

陈独秀先是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叫《青年》的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到北京后 他把这个杂志也带来了。这个杂志很快成了北京大学新派人物发表意见的一个阵地。陈独秀还邀请了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和鲁迅等人组成《新青年》编辑委员会，轮流坐庄主编。他们从每月的薪水里拿出几块大洋支付印刷费。这个杂志在当时影响了一代人，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一接触到《新青年》，就成了这个杂志最热心的读者。

聚集在《新青年》麾下的新派人物，迅速在思想界刮起了一股引入新学问、新方法和新思潮的旋风。实验主义、柏格森主义和各种名目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那时候 动不动说什么“主义”成了知识界的一种时髦。在长沙的青年毛泽东形容说，这些新思潮的传播，就像打开了洞庭湖的闸门 潮水将席卷一切 顺它的生 逆它的死。

新的东西来了，旧的东西就必然受到冲击，那时候，新派人物一心要破除的 是传统的旧道德、旧伦理 传统的旧文化、旧思想。他们反对文言文，提倡文学革命，他们反对旧礼教，提倡道

德革命。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宣称过去的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他们手里拿的批判武器，是从西方学来的，主要是两件法宝，一件叫“德先生”就是民主，一件叫“赛先生”就是科学。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于 1918 年秋天来到了北京大学。校方给了他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成天的工作就是整理新到的各种书刊报纸，一一把它们放到书架上面。他还操着满口的湖南话，负责接待到这里阅读的文化名流。有时候，他试着和这些名流聊天，但由于许多人不懂湖南话，也就没有把他当回事。于是，他更多的时间是用来阅读各种各样新到的报刊，近距离地感受着新文化运动传播的新思潮。

新文化运动说到底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它启发了人们的科学意识、民主意识和民族意识。受《新青年》鼓舞而由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其英文名字就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

大悲痛点燃一把火

在新文化运动搞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法国的巴黎正在进行一场肮脏的交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这里举行所谓的和平会议。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挤入战胜国的一方，中国国民的狂喜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在故宫的太和殿，北洋政府举行了盛大阅兵式，庆祝的宴会在这里摆了一次又一次。当时，从天安门广场到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到处是游行、集会和欢庆的民众。北京各大中学校放假三天，师生们连续五天在

中央公园举行演讲大会。夜幕降临了，欢腾的人群意犹未尽，老百姓纷纷提着灯笼游行。

在一片如狂的欢喜中，有一个人似乎显得特别冷静。1918年1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中央公园作了两次演讲。题目是《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说：“我们这几天庆祝胜利，实在是热闹得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哪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Bolshevism 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

这是在中国第一次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开演讲。但是，人们并不大懂得李大钊演讲的道理，这似乎只是诸多演讲中的一个而已。

但两个月后，情况就不同了。

1919年1月，从巴黎和会传来的消息让中国人大吃一惊。中国代表居然不能正式参加会议，而只能列席会议；中国代表反复向会议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提案，都遭到了拒绝，连收回战败国德国从前占据的山东的期望，也化为了泡影，因为日本代表拒绝把日本占据的青岛和胶济铁路归还中国。中国代表两手空空，空得了一个“战胜国”的头衔。如果说有什么收获的话，便是带回来了一些古代的天文仪器，那是德国从前从中国抢走的東西。

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再一次成了被人玩弄的对象，中国人再度蒙受比鸦片战争割让香港还要沉重的耻辱。中国人开始了从大喜到大悲的心路转折。

这时的新文化运动，大大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意识。当时的中国人正在寻找属于自己的新纪元的黎明，但是，

太阳并没有从中国升起来。巴黎和会的消息，让人觉得，连自己国家的摇篮也被抢走了。就连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斯也不得不说：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中国一样对巴黎和会抱着如此大的期望，那些控制巴黎和会的老头们的决定，使中国人一下子坠入了黑暗的深渊。

正是在一片绝望气氛中，孕育了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事件。一个参加这个事件策划活动的北京大学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开始考虑表达对政府不满的办法。最后决定，惟一能立刻做到的，是召集北京的学生举行一次大游行。在大家的情绪十分激动的时候，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猛地站起来，当场撕下衣襟，咬破中指，用血写下“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所有到会的人都肃然感动。会场顿时显出悲壮和凄凉的情景。

1919年的5月4日是个星期天。下午一点，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天安门广场远没有今天这样宽广，但已经是北京城里最宽阔的一块地方了。在游行队伍中，人们高举着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用血写的“还我青岛”的衣襟。学生们还沿途散发一份《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上面写着：“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美国学者杜威是5月1日刚刚来到北京的。他是胡适的老师。5月4日那天，他真实地看到了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游行，接着写信给美国的女儿说：整个示威游行是经过细心计划的，这些孩子们竟然负起了一场政治改革的领导责任，受到人民的欢迎。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那时候，学生们最痛恨的是早些年代表袁世凯政府和日本人签订割让山东主权密约的曹汝霖。当游行队伍走到东郊民巷的时候，不知是谁说了声：“找曹贼去！”学生们便朝着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家里拥去。曹汝霖的家是一个西式院落，这时已经

大门紧闭，还有几十个军警看守。学生们就朝窗户和院墙里面扔石头和白旗帜，要求曹汝霖亲自出来解释为什么和日本签订密约。曹汝霖当然不敢出来。有五个手脚麻利的学生没费多少周折就翻进了院墙，打开了大门，大队学生一拥而入，但没有找到曹汝霖。

其实，曹汝霖就躲在一间像箱子一样的小屋子里。几十年后他回忆起往事说：“我在里面听到砰的一声，知道学生蜂拥而入。后又听得乒乒乓乓响成一片，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瓷器落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

没有找到曹汝霖，有个叫匡互生的学生干脆放了一把火。大家还把躲在这里的另一个卖国官员章宗祥痛打了一顿。

5月4日这天，军警逮捕了32名参加游行的学生。第二天，北京各个学校的学生通电全国，宣布从即日起开始总罢课，以抗议政府逮捕学生。北京的学生运动，震惊了中国。它像一个导火索，从5月底到6月上旬，把整个中国都引爆了。据统计，当时有22个省份的200多个大小城市都采取了行动。在6月上旬，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达到高潮。近代以来，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情绪在这时候来了一次总的爆发。

人们一致的要求是，政府必须改变对学生的态度，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迫于全民的压力，政府只好逐步答应了这些要求。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政治风波，实际上仅仅持续了不到两个月。可是，它却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82年了。有人统计过，五四运动那些知名的学生领袖，当时年龄大多在22岁以下。他们的很多同学和

几乎所有参加运动的中学生，还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那些给他们提供新思想的教师，也大多是 30 岁左右的知识分子。一个年轻的群体，为了自己的国家年轻的未来，掀起一场年轻的运动，从而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改造进程。这大概是五四运动给后人留下的最可思索的话题。对五四运动，胡适后来多少有些遗憾。在他看来，一场政治风波，使他的学生多了一些政治家，少了一些学者。的确，在五四运动中崭露头角的青年，后来大部分都成了现代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李大钊、陈独秀的直接影响下，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刘仁静、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等青年，后来都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内的著名人物。

一本书的传奇

1920 年 1 月，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乔装打扮成一个商人，坐着李大钊赶的一辆骡车，悄悄地离开了北京。陈独秀因从事爱国活动被军阀政府逮捕，出狱以后，他决心到上海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们分别的时候，相约各自在南方和北方活动，组建一个政党。

建党首先需要一种理论武装。在陈独秀离京的行李中，有一本叫《共产党宣言》的英文书。这是他特地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走的，准备带到上海物色合适的人选把它翻译成中文。

人们用文字给思想插上了翅膀，但它飞越千山万水寻找落脚生根的地方，却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行程。

在 1919 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和他们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零零星星地被介绍到了中国，但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但五四这场政治风波，把一个问题鲜明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从根本上改造中国。这样一来，

新文化运动传播的各种新思想，堂而皇之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并且在思想上和行动中开始了各种各样的选择。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连同他的主张，也就越来越引人注意了。正是形势的迫切需要，使陈独秀觉得，有必要翻译出版一本完整的《共产党宣言》。

陈独秀到达上海不久，在上海附近的浙江义乌县分水塘，一位叫陈望道的青年正在夜以继日地开始做一件大事——翻译《共产党宣言》。不过他依据的是一种日文版。刚到上海的陈独秀听说后，大喜过望，立刻把自己带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托人带给了陈望道，供他翻译时参考。

陈望道译完这本书，到上海找到了自己的学生俞秀松，托他把译稿转给了陈独秀。陈独秀仔细翻阅了译稿，非常满意，还动笔校对了一遍，决定作为图书正式出版。但是，他遇到一个现实问题：怎样筹措出版经费呢？

恰在这时，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共产国际特使来到了上海，担任翻译的是俄籍华人杨明斋。他们来华的目的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们此前在北京曾和李大钊联系，商量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们到上海来找陈独秀。

在上海，陈独秀和维经斯基讨论建党的时候，提到准备出版《共产党宣言》但印刷遇到了困难。维经斯基当即决定从带来的共产国际的经费中抽出一部分帮助印刷。

出版《共产党宣言》和筹建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同时开始了。

1920年8月，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印刷出来了。由于排印疏忽，封面上的《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产党宣言》。但这本小书的发行终于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多年前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声音，通过一个个方块字，在中国的大地上爆

响。书中的翻译难免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仅仅是“有产者”、“无产者”、“阶级斗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样的词句，就会使许多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进步人群，获得难以估计的力量。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是通过阅读这本书以后开始确立自己的信仰的。

毛泽东后来就说：1920年我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以后，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也许，《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在今天的人们心目中已经是遥远的过去，然而，历史的变迁总是从第一步开始的。无论后来的历史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那第一步总是令人难以忘怀。所以在将近30年后，周恩来对《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翻译者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1920年《共产党宣言》出版的时候，邓小平正在前往法国勤工俭学的途中。晚年谈起青年时代的往事，他也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创办了一所干部学校，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1920年夏秋之际，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汪寿华等都是这里的学员。那时，每个学员都发一册《共产党宣言》，并由陈望道给他们讲授。刘少奇曾回忆：“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

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人的命都不要了，其他就好说了。”

当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国内逐渐传开时，许多远在海外寻求真理的进步青年，也是通过《共产党宣言》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当时到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学生中，《共产党宣言》是他们阅读和讨论最多的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蔡和森在补习了四个月的法语后就开始“猛看猛译”《共产党宣言》。他把《共产党宣言》段落抄录在卡片上，站在开会的会场上向大家讲解。陈毅、向警予都是一边学法语一边读《共产党宣言》。李维汉则回忆说他读的是蔡和森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从此才明白只有走十月革命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

1922年朱德出国前没有读到《共产党宣言》。他后来说我当时还毫无所知，手里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文献，连一份《共产党宣言》也没有。他当时读《共产党宣言》的心情非常急迫。1922年经周恩来介绍，朱德在欧洲入了党，才第一次看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周恩来送给他的。由此看来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至少在1922年就流传到海外了。

初版的《共产党宣言》一共印了一千本，如今留存世上被发现的有7本。而在这每本书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动人的历史，一个动人的故事。

1975年，也就是周恩来逝世的前一年，他在一次会议上见到陈望道十分关心地问起你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版找到了吗那真是十分珍贵的呵陈望道回答说太遗憾了现在还没有找到。

事有凑巧，就在这一年，山东广饶县的刘集村，第一次发现了周恩来关注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这本书最早的主人是20年代初在济南党组织负责青年工作的张保臣。有一个来自广饶

刘集村的青年女教师，叫刘雨辉，经常参加他组织的学习小组。不久他把这本《共产党宣言》送给了刘雨辉。1926年，刘雨辉回到家乡过春节，送给刘集村党支部的礼物，就是这本《共产党宣言》。

从此，这本《共产党宣言》成为了刘集村党支部经常学习的材料。党支部书记刘良才，经常给人们讲书中的道理。不识字的人就问：这些道理俺以前没有听说过，到底是谁讲的呀。刘良才就指着书上的马克思头像说就是这个“大胡子”说的。于是当地老百姓就把《共产党宣言》改了个叫法叫“大胡子的书”。他们经常说：“照大胡子说的做，没错！”《共产党宣言》教育了刘集村几代共产党员，刘集村为革命献出了28位烈士，有190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1年，刘良才被党组织调到其他地方工作，临行前，他把这本《共产党宣言》交给了第二任支部书记刘考文手中。1932年刘考文被捕前，又将《共产党宣言》交给了老共产党员刘世厚保存。为了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刘世厚曾把《共产党宣言》埋进锅灶下面，后又转到粮囤下，几经转藏，他又塞进房屋山墙的鸟窝里。1941年4月18日，伪军扫荡刘集村，全村着了大火，已经跑出村外的刘世厚，傍晚时分又偷偷返回家里，从着火的房子里抢出了《共产党宣言》。新中国成立后，他用棉线把这本快散页的书重新缝好，在扉页上盖上了自己的私印，用油纸和老蓝布层层包好，放进一个小漆匣里。1975年，85岁高龄的刘世厚老人把这本书献给了国家。

红色的起点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个怪物就是共产主义。”

这是 1920 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如果用今天通行的翻译语言 这句话是：“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游荡。”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 对这句话自然是耳熟能详。

那么 作为“幽灵”的共产主义 又是怎样在黑夜沉沉的中国大陆“游荡”一番后 凝聚起一个战斗群体来的呢？

《共产党宣言》刚刚问世的时候 尽快建立共产党组织 已成为一些先进分子的普遍共识和愿望。1920 年 8 月，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他的好朋友毛泽东写来了一封信，里面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必如此 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毛泽东在回信中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上海率先组建了第一个地方共产党组织 在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也都成立了党的组织，在国外的留学生中，也成立了旅欧、旅日的共产党组织。这些组织，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支部”而上海则干脆叫“中国共产党”。后来，人们把这些早期的地方党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全都是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不到 20 岁的青年学生。他们奔集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面，从这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于是，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已是瓜熟蒂落的事情了。

1921 年 6 月 29 日傍晚，湖南青年毛泽东和已是中年的何叔衡，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一辆开往上海的小火轮。他们走得很突然，也没有亲友送行。只有何叔衡的同事谢觉

哉知道他们的行踪，但也不敢声张，只是在日记里简单地记下了一笔：“午后六时 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毛泽东）赴全国○○○○○之招。”对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一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圆圈代表意思。

7月中旬，毛泽东和何叔衡住进了上海太仓路 127号的博文女校，和他们一同住进来的还有十来个人，对外都说自己是“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成员。7月 23 日晚上他们齐聚到了属于法国租界的望志路 106 号和 108 号，也就是今天的兴业路 76 号，共同揭开了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成立中国共产党。后来人们把这次会议叫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天晚上有 15 个人参加了一大，除 13 个中国人外，还有两个共产国际方面派来的代表。这些人从莫斯科，从日本，从中国的北方、南方赶来。或说德语，或说英语，或说俄语。有的操湖北、湖南口音，有的操江西、山东、广东、贵州等各地的口音。有穿长衫的，有穿对襟纺绸白上衣的，有穿西式衬衫还结着领带的。他们或留着八字胡，或满脸络腮胡子，或一副教授派头，或一派学生模样。初次的会议很随便，并不讲究座次的排列顺序。和在座的许多人比较起来，穿长衫的毛泽东还算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和从日本赶来的周佛海一同担任记录。

让人遗憾的是，建党初期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南陈北李，都没有能够到会。北京大学的李大钊因为校务过忙，陈独秀则是因为在广州政府任教育委员长，正筹备广东大学。两个人都是社会名流，动静也不能过大。

全体会议开了 5 次，各地代表先后报告了工作情况，然后是讨论党的纲领和今后的实际工作。与会者是清一色知识分子，

个个都有主见，又多是意气风发的青年人，讨论起来的热烈气氛可想而知。遗憾的是当时不可能有录音，更不用说录像了。但从档案和回忆文字来看，差不多对每个问题都有不同的意见。

不料在 7 月 30 日那天晚上，一个陌生人的闯入，打断了代表们的争论。他说他要找什么社联的王主席。这一问引起了与会者的警觉，会议被迫停开，代表们迅速离去。不久，果然来了法国巡捕房的一干人马，毫不客气地搜查了全部房间。当天晚上，代表商定，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继续开会。

20 多年后，毛泽东在七大会上回忆起这个开天辟地的一幕，很有感触地说：一大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水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情如何办，也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

一大是在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曾一度遭到法租界的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以至于若干年后，那些亲历者都记不清会议召开的确切日期了。1938 年 5 月，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壮大，纪念党的诞辰也提到日程上来了。可是，搞不清具体日期，毕竟给纪念活动带来了困难。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人们就向他们讨个说法。他们两人反复回忆，只记得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究竟是 1921 年 7 月哪一天，无法肯定，最后毛泽东说：这样吧 就用 7 月份的第一天作为纪念日。于是，7 月 1 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历史就这样赋予了它一个特殊的含义。

在这以后，人们也一直没有弄清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直到 1980 年 才有专家考证出是 7 月 23 日那天开的会。至于结束日期，也是从与会者陈公博当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推断出来的。 7

月 30 日那天晚上由于法租界的巡捕闯入一大会场，陈公博从会场回到他居住的上海大东旅社，7 月 31 日凌晨 5 点他住的隔壁房间里突然传出来一声尖利的枪声，把他从梦中惊醒。后来知道是一对男女殉情自杀，男的向女方开枪后自己却溜走了。人们按陈公博文章提供的线索，查阅当年的报纸，果然刊登了这则消息。而一大代表也正是在 7 月 31 日一大早乘火车前往嘉兴的南湖，会议当天就结束了。但陈公博没有去嘉兴，而是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去杭州西湖散心去了。至于他是由于新婚，还是因为受到惊吓而没有去嘉兴开会，曾有过不同的猜测。但这并不重要。革命路上的同路人后来分道扬镳的，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在浙江嘉兴南湖上面，代表们扮成游客，在一条红色的画舫上面，最终通过了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的书记。中国共产党在它的第一个纲领中，主要阐述了革命军队、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等重要问题。在今天看来，当时的主张主要从书本里得来，难免抽象，对中国的现实国情还缺乏具体深切的了解，但这毕竟成为了一个象征，一个将改变中国社会的政党，在一条小船上起锚远航了。

红色的游船 红色的起点 红色的旅程 红色的故事 就这样成为了通向未来的一个坐标。

一大的 13 个参加者，年龄最大的 45 岁，最小的 19 岁，平均 28 岁，正好是毛泽东的年龄。这些年轻人以改天换地的气概，一心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国土上创立一个崭新的合理的社会。这个组织在日后发展得如此迅猛，大概连当初的 13 个参加者自己都是没有预料到的。

历史常常有些有趣的插曲。也是在 1921 年的 7 月，在北京

也成立了另一个“中国共产党”他们创办了一个《今日》的刊物，人们就把这个组织叫作“今日派共产党”。其组织者胡鄂公是北洋政府的国会议员。当他们听说上海也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以后，立即派人赶往莫斯科，要求加入第三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争“正统”。但遭到了拒绝。不久，这个组织就烟消云散了。

历史总是严格地挑选着那些能够把握历史脉搏的群体，同时也选择那些始终不渝地为真理奋斗的人们。80年光阴似箭，中共一大13位代表都已作古。他们曾在黑夜沉沉的时刻相聚一起，为中国的历史悄悄地点了一把非同寻常的烈火。在这以后，却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有的中途消沉退隐；有的曾轰轰烈烈，但后来却背叛了革命；有的甚至当了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汉奸；但多数人却始终挺立在革命的潮头，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大浪淘沙，岁月无情。他们曾经站在同一条政治的起跑线上，而结局却如此纷至杂呈，看来，值得深思的不光是历史，还有每个人都时刻面临的人生道路。

工人头上一片天

1922年元旦那天，一张小小的贺年卡，分别送到了上海一些与共产党组织有联系的人士手里。一时间，人们奔走惊呼：“共产主义的幽灵飘到了上海！”

其实，这张贺年卡上只写了一句当时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最后一句话：“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

共产党人这一特殊的亮相，明确传达出他们当时正在做的一件实际工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首先应该从哪里入手去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呢？在这个幼年的党看来，事情似乎很简单。既然它属于

无产阶级的政党，就应该集中力量到工人中去工作。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是承担革命运动的主体力量。于是，中共成立半个月后，就组建了一个公开做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有意思的是，这个机构的名称中，前半部分“劳动组合”，是日本名词，意思是“工会”，后半部分“书记部”却是俄语名词。它的总部设在上海，在北京、长沙、武汉和广州都设有分部。

事实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就已经把组织工人运动作为了工作的重点。为了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李大钊派出邓中夏、张太雷等人到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创办工人夜校。他们讲课的方法也形象生动。人们常说上天是最大最高的，他们就用“工人”二字摺在一起，说这就是一个“天”字，工人阶级就是天，自然要当家做主。

湖南的毛泽东，也是在“工人”两个字上做文章。他从上海出席一大回到湖南不久，就背着一把雨伞到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做工作。他进工棚、下矿井，还在工人夜校里对工人们说：“工”人的“工”字，上面一横代表天，下面一横代表地，工人就是中间的一竖，站直了，就是顶天立地。

毛泽东在安源播下了火种。不久，刘少奇、李立三也先后去安源。许多人都看过一部叫《燎原》的电影，而这部电影就是根据刘少奇在安源领导工人罢工的故事改编的。当时，李立三是罢工总指挥，刘少奇是工人全权代表。罢工从 1922 年 9 月 14 日那天开始，工人们提出的宣传口号是：“先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工人们散发的罢工宣言读起来更让人觉得酸楚不已：

各界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呵：

让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地丧失人格呵！我们的工钱是何等地少呵！我们所受